

# 符號學研究的反身自省： 返回符號體系的思考

The Reflexivity of the Semiological Studies:  
Thinking Back to the Sign Systems

陳明珠

Ming-Chu Chen

世新大學廣播電視電影學系 助理教授

Assistant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Radio, Television and Film

Shih-Hsin University

## 【摘要 Abstract】

符號學作為美學、文本分析的研究方法論，普遍在傳播學研究領域中被使用，臺灣以往有關傳播符號學的論文多半是探討符號的連結與應用，舉凡論述、影像、文字、聲音、圖像等的符號分析，研究的方向多朝向探究意符與意指之間的任意連結，帶有其特殊的文化意涵，運用意識形態理論或雙層符號系統中神話的意指作用分析，來詮釋符號運作的深層文化意涵。然而，這些研究面向主要將符號的概念帶進與文化意涵連結的專斷穩固性與符號的不變性探討，透過符號的運作體系來詮釋文本，對於符號方法論的反身思維卻少有看見，許多研究者將研究焦點放在詮釋符號的目的，卻忽略了對符號語言體系的反思檢視，如：何以研究者會如此詮釋符號？是什麼樣的體系在影響研究者的詮釋？這特殊符號系統的結構是如何運作形成的？符號語言學之父Ferdinand de Saussure將語言分析帶進一個結構性的符號系統分析，強調語言是一套符碼系統的運作；電影符號學大師Christian Metz聲稱電影可以視為一種語言，卻非一套語言系統；研究物體系的著名學者Jean Baudrillard提出物體系不同於語言結構，不構成穩定的符碼系統，



而是處於演變狀態。這些重要的原典論著不僅使用結構主義符號學的研究方法，更將符號的討論回歸到符號系統的反思。因此本文的目的在探究符號學方法論的反身自省，重新探討符號的可變性思維、共時與歷時分析方法的檢討、返回符號系統的思考、研究者的反思自省等議題，這些符號學方法論上的問題需要重新被關照，如此在符號詮釋的研究中，才能更深一步地返回詮釋體系的探討。

Being a significant methodology of esthetic and textual analyses, semiotics often applies to the research field of communication studies. Most of the academic researches of communication semiotics in Taiwan focus on the articulation and practices of the signs. Those studies analyze and discuss the arbitrary relation between signifier and signified and the specific cultural meaning of signs. Moreover, the researchers use theories of ideology or two semiological systems to interpret the cultural myth in the process of signification. The investigation of the arbitrariness and immutability of signs in cultural system and the interpretation of signs are the central concerns in those studies. However, the reflexivity of the semiotic methodology is irregularly discussed. The sign system itself as a tool of interpretation is seldom investigated and rethought. Why did the researcher interpret signs as they would be?

What kind of sign system influences the researcher's interpretation? How does this certain structure of sign system practice in the process of interpretation? Those are reflexive thoughts in semiotic researches. Ferdinand de Saussure, the father of semiotic linguistics, developed the structuralist analysis of linguistics and emphasized language as a practice of code system. Christian Metz, the master of cinema semiotic studies, brought up that film could be seen as a language, but never a language system. Jean Baudrillard, the famous scholar on the study of the system of objects, indicated that, unlike a language system, the system of objects was not constructed by a fixed and immutable system. These important discourses could remind researchers of returning to the investigation of sign system. Thus, the aim of this article is to rethink the reflexivity of semiotic studies. Those questions such as the mutability of signs, the application of synchronic and diachronic

methods, the reinvestigation of sign system, and the reflexivity of the researchers would be discussed and rethought. From reflexive thinking, returning to the concern of the interpretation system would help semiotic researchers toward a deeper discussion of sign practice.

### [ 關鍵字 Keywords ]

符號學；可變性；共時；歷時；符號系統

Semiotics; Mutability; Synchrony; Diachrony; Semiotic System

## 壹、前言

符號學作為美學、文本分析的研究方法論，普遍在傳播學研究領域中被使用，臺灣以往有關傳播符號學的論文多半是探討符號的連結與應用，舉凡論述、影像、文字、聲音、圖像等的符號分析，研究的方向多朝向探究意符與意指之間的任意連結，帶有其特殊的文化意涵，運用意識形態理論、或雙層符號系統（two semiological systems）中神話（myth）的意指作用（signification）分析，來詮釋符號運作的深層文化意涵。這些研究都是探究文本中符號的意義是如何產製的，並透過文本的符號體系，來討論符號與文化之間迷思的建構。然而，這些研究面向主要將符號的概念帶進與文化意涵連結的專斷穩固性與符號的不變性探討，透過符號的運作體系來詮釋符號文本，對於符號方法論的反身思維卻少有看見，許多研究僅將研究焦點放在詮釋符號的目的，卻忽略了對符號語言體系的反思檢視，如：何以研究者會如此詮釋符號？是什麼樣的體系在影響研究者的詮釋？這些特殊符號系統的結構又是如何運作形成的？本文將以回到符號系統的反身自省為題，從原典理論方法的閱讀，重新審視符號學方法的相關研究。

符號學作為一種方法論，採深度聚焦式地解讀符號、人與社會文化的脈絡關係，探究意義溝通的法則。結構語言學之父Ferdinand de Saussure即認為語言系統就是「儲存在每個人腦子裡的社會產物」，是一種具有結構性的符號系統、一種集體式的社會規約。Saussure將人類溝通的言語活動（langage）分為語言（langue）與言語（parole），言語活動是個人的、亦是社會的，它展現一種既定的制度，也包含了演變狀態，是自由的，也是變動的。在言語活動中，語言是社會性的、約定俗成的，是同質、穩定的，也是符號系統的；而言語則是個人的，它的執行完全由個人來進行。Saussure強調他所研究的符號結構主要是語言系

統，而非個人言語。他認為語言應「歸入人文事實」，是「一種社會制度」，一種「表達觀念的符號系統」，是「一門研究社會生活中符號生命的科學」（de Saussure, 1966／高名凱譯，2003，pp. 36-38）。然而，語言系統結構的形成端賴言語的進行，語言與言語二者互為前提，有相互依存的關係。語言既是言語的工具，亦是言語的產物；言語也是語言的產物，又形成語言系統。語言系統雖支配著言語活動，然言語活動也影響語言系統的演變。由此觀點可見符號系統（語言）與符號使用（言語）之間的關係，人作為符號的使用者，因為集體使用而形成符號系統的建制，同時也影響符號系統的演變。

綜觀國內外符號學的各類媒體研究，無論是分析電影、電視、新聞、廣告、網路、流行文化等，普遍以範例、個案式的研究，採立意取樣，選取相關研究主題的幾則廣告、報導、影像片段等作為分析的文本，這些研究主題趨向於個別符號運作（言語活動）的意義分析，雖然採用Saussure以來發展出來的符號系統的分析方法，卻鮮少回到符號系統本身的探討，僅聚焦於符號意涵的解析，而忽略了符號系統的結構與社會文化關係的關注。顯然，許多採用符號學方法的研究者們將Saussure以來一脈發展出來的符號學方法用來拆解各式符號（言語）活動，作為詮釋符號意涵的工具，但誠如Saussure所強調的「語言與言語活動不能混為一談」，語言是言語活動的一個確定的部分，是言語機能的社會產物（de Saussure, 1966／高名凱譯，2003，p. 30）。這使得我們不得不重新審視傳播學研究在使用符號學方法時所遭遇的問題。

從原典論著觀看，我們可見不同的符號分析方法運用在各種不同符號體系的研究上。如Saussure將語言研究帶入一個結構性的符號系統分析，強調語言是一套符號系統的運作；電影符號學大師Christian Metz在早期的論著上曾聲稱電影可以視為一種語言，卻非一套語言系統；而研究「物體系」（the system of objects）的著名學者Jean Baudrillard提出物體系不同於語言結構，不構成穩定的符碼規約，而是處於演變狀態。這些重要的原典著作不僅使用結構主義符號學的研究方法，更將符號的討論回歸到符號系統的反思。因此本文的目的在探究符號學方法的反身自省，重新探討符號的可變性思維、共時與歷時分析方法的檢討、返回符號系統的思考、研究者的反思自省等議題，這些符號學方法論上的問題需要重新被關照，如此在符號詮釋的研究中，才能更深一步地返回詮釋體系的探討。

## 貳、符號學方法的普遍概括性使用

符號學的研究繁雜眾多，在跨學科的研究風潮中，「符號學實現了與諸學科的合作」，可說是最典型的跨學科運動（李幼蒸，1998，頁218），舉凡文學、美學、哲學、自然科學、人文科學、社會科學等各學門都有運用符號學方法的研究。而有關採用符號學方法的傳播學研究，從近十多年來本土碩博士論文<sup>1</sup>來看，符號學已普遍成為分析影音、文字、圖像文本的方法之一。如各類型廣告文本的符號研究（蘇玲霞，1989；唐維敏，1991；王淑娟，1993；賴怡茜，1994；張淑寬，1995；翁秀琴，1995；林政諒，1997；梁惠明，1997；邱誌勇，1999；蘇偉華，2000；林信宏，2002；陳奕宏，2003；黃立翔，2003；林忠和，2005；楊淨嵐，2006）<sup>2</sup>，亦有針對性別文化議題的廣告文本分析（顧玉珍，1991；吳家翔，1997；胡惠君，1997；陳聖暉，1999；林俊良，2001；吳珮琪，2002）<sup>3</sup>，另有解讀影像文本意涵的研究（張斐茜，1994；曾維瑜，2000；林慧羚，2006）<sup>4</sup>、新聞內容的文本分析（王念綺，2003；林月芬，1993；翁宜寧，2000；李欣榮，2006）<sup>5</sup>、漫畫的圖像意涵（劉平君，1995；徐佳馨，2000）、傳統文化變貌（張毓吟，1994；洪盟凱，2001）、流行音樂的分析（柯永輝，1993；王家慶，1995；蘇振昇，1998）、聲音流程的符號分析（雷光夏，1993；張瓊云，2000）等。這些論文都是探究文本中符號的意義是如何產製的，並

1. 本文所列舉之碩博士論文，以國家圖書館全國碩博士論文資訊網中關鍵詞「符號學」所羅列之傳播類論文為主。其他尚有文本分析、敘事分析等可能連結符號學方法的論文並不包含在此。除了針對媒體文本的意涵分析，符號學方法亦有運用在商品行銷策略、視覺傳達設計、商業應用設計等的實用研究論文，但亦不在此列。
2. 各類廣告文本的符號分析，包括有飲料廣告（王淑娟，1993；林政諒，1997）、運動廣告（林信宏，2002）、募兵廣告（林忠和，2005）、汽車廣告（翁秀琴，1995；梁惠明，1997）、競選廣告（陳奕宏，2003；黃立翔，2003）、酒類廣告（張淑寬，1995；蘇偉華，2000）、洋煙廣告（蘇玲霞，1989）、現金卡廣告（楊淨嵐，2006）、意識形態廣告（唐維敏，1991；賴怡茜，1994）等。
3. 這類與性別相關的廣告分析，多以女性商品為主，如美體瘦身廣告、美容塑身廣告、少女雜誌廣告等，此外尚有探討空間與性別關係的汽車廣告解讀（林俊良，2001）。
4. 影像文本的符號學研究，如齊隆壬（1992）的電影符號學一書，運用結構主義與後結構主義來解讀中西電影與廣告文本的意涵。碩博士論文中亦有採用符號學分析電視偶像劇文本（曾維瑜，2000）、電影文本（張斐茜，1994；林慧羚，2006）等。
5. 新聞文本的符號分析則有：國家形象的報導分析（李欣榮，2006）、選舉新聞的分析（林月芬，1993）、健康新聞的分析（王念綺，2003）、運動新聞分析（翁宜寧，2000）等。

透過文本的符號體系，來討論符號與文化之間迷思的建構。碩博士論文中，有單以符號學為主要分析方法，再沿用其他理論，如意識形態理論、性別理論等作為詮釋的理論基底之研究；或同時使用符號學、敘事理論分析、類型分析等多元質化方法的取徑分析；亦有些論文採質化、量化的混合研究法進行，如使用內容分析或閱聽人問卷調查方法等作概化分析，並同時以符號學方法進行文本意涵的探究。以下即簡要概述符號學方法在傳播類各式論文中普遍被使用的梗概。

### 一、意符 (signifier) 與意指 (signified) 的任意 (arbitrary) 連結與不變性 (immutability)

Saussure (1966) 指出，符號系統中所連結的不是事物與名稱，而是意符與意指。符號是可感知的物質形式，不論是影像、聲音、文字、圖像等，是意義的承載者。符號就是意符與意指相連結所產生的整體，而意符與意指的聯繫是任意的，二者之間沒有任何內在的關係。然而 Saussure 在此加上了一個註解，任意性不應該使人以為意符完全取決於符號使用者的自由選擇，意符與意指的任意性連結是不可論證的 (de Saussure, 1966 / 高名凱譯, 2003, pp. 101-104)。但這樣的任意性連結必然經過集體習慣或約定俗成，形成一種共同制約的穩定體系，才能使社會成員彼此得以溝通意念。這種穩定的符號體系運作，Saussure 稱為符號的「不變性」，在此意符對它所表示的意指來說，雖是任意連結的，但對使用符號的社會來說，卻不是自由任意的，而是強制的。換言之，符號的不變性隱藏著強制的規約，社會成員必須按照符號法則，才能進行溝通，有如符號文化的政治運作 (陳明珠, 2006)。因此，普遍看來，意符與意指的連結經常是符號學方法操作的核心，其任意專斷性的連結與符號的不變性使得研究者容易將焦點放在尋求意指的研究目的上。

從意符與意指的連結發展出來的概念尚有外延 (denotation) 與內涵 (connotation)<sup>6</sup>、表述 (express) 和內容 (content)<sup>7</sup> 等，都是採用符號學方法的研究中常見的解析方法。亦有採用 Barthes 雙層符號系統

6. 外延與內涵的概念以 Barthes 所提出的雙層符號系統為基礎，指出外延是表意過程的第一個層面，可稱為直接意指；而內涵是表意系統的第二層面，內涵的意符是由外延系統的符號所組成，亦即外延意義成了內涵的意符，並將另一層意指附加其上，可稱為含蓄意指。參見 Barthes (1988)，*符號學要義*，洪顯勝譯，頁 111-115。

7. 表述與內容的概念由 Louis Hjelmslev 發展出來，認為符號中的表述與內容都各自具有形式與實體，在此，形式是被確定不動的，而實體則是可變動的變項。參見 Barthes (1988)，*符號學要義*，洪顯勝譯，頁 59-60；Hawkes (1988)，*結構主義與符號學*，陳永寬譯，頁 68-69。

<sup>8</sup>的方法，為要解讀出文本的深層意涵，亦即「迷思」。另也有簡單採用美國符號學者Peirce符號三類：肖像（icon）、指示（index）和象徵（symbol）的概念，作為符號分析的類別。這些研究的操作有些過於簡易，而失去了原典方法論上的複雜思維。如運用雙層符號系統的分析，許多研究僅止於所謂「雙層」的思維，將第一層的符號轉換為第二層的意符；然Barthes（1983／敖軍譯，1998）的方法思維不僅如此，第一層的符號亦可能轉換為第二層的意指，同時Barthes在流行體系的服飾符碼分析時，其方法的操作更是多層次體系的複雜思維，不受限於雙層的思考。Peirce的符號三類也並不僅止於三類，其分類法十分繁複，具有所謂比較的、表演的、思想的三合一符號關係，大體上可分為十大類別，其細分類別有六十六種不同符號的組合。<sup>9</sup>這些原典方法論上的操作都有其特殊的符號思維，而非僅於拆解意符試圖找出對應的意指，來尋求文本的意義。反觀本土論文中多半將研究的焦點放在各式意符的詮釋上，意圖解讀影音、文字、圖像等的意指，然符號體系作為意義產製的系統，亦是研究者使用的詮釋系統，卻不見有反身性的討論。「是什麼意義」固然重要，但「意義如何產生」、「意義何以如此產製」、「符號體系是如何運作的」亦是符號學研究不可漠視的課題。

## 二、系譜軸（paradigm）與毗鄰軸（syntagm）的分析

由於符號意義不是個別存在的，它需要從上下文脈組合的概念來形成意義的確定，並從中取得它的價值。因此除了符號基本單位由意符、意指連結而成之外，符號的組合分析成為符號學方法另一個重要的操作面向。任何文本都有所謂組合的關係，將各種不同的單位元素構連在一起，形成意義，這種組合而成的關係即稱為毗鄰軸的分析，亦即橫組合的分析。在Saussure的語言學研究中稱為句段的關係，如同語言中的文法結構，一個挨著一個排列在言語的鏈條上。在圖像的毗鄰軸分析中亦可分為顏色、光影、實物、人物（服裝、表情、動作）、背景等組合，透過這些元素的組合關係，形成了圖像的意涵。而系譜軸又稱為縱聚合的分析，是一種聯想的關係，具有選擇的機制。它不是以鏈條、組合為基礎，而是將具有某種共同點的相似、相關甚或對立的元素集結在

8. 有關Barthes所提出的雙層符號系統，見Barthes的論著：敖軍譯（1998），*流行體系（一）：符號學與服飾符碼*，以及許薈薈、許綺玲譯（1997），*神話學*，頁174-177。書中有詳細方法的操作思維，此處不多論述。

9. 見Hawkes（1988），*結構主義與符號學*，陳永寬譯，頁120-123；Noth（1990），*Handbook of semiotics*, pp. 39-47.

一起，這些聯想關係的元素是在人們的記憶裡，當進行言語活動時，人們會個別從所知的一組相似意指的意符中選擇其一，來與其他意符組成句段。Saussure (1966) 指出：「句段關係是在現場的；它以兩個或幾個在現實的系列中出現的要素為基礎。相反，聯想關係卻把不在現場的要素聯合成潛在的記憶系列。」(de Saussure, 1966／高名凱譯，2003，p. 171) 相關的詞彙形成系譜軸，而句段的連結是毗鄰軸；系譜軸涉及選擇的意圖，而毗鄰軸則是組織的概念 (Fiske, 1990／張錦華等譯，2003，pp. 81-83)。

Barthes從系譜軸與毗鄰軸的分析中發展出各種不同系統的元素組合，稱為「單位語符列」，有如Saussure所言的句段關係。Barthes (1984) 認為無論是衣著、食物、家具、建築等都有其系統的運作。如食物系統中，西餐的食用有其次序，前菜、正餐、甜點等的次序組合如同毗鄰關係，而菜單中各類的選擇有如系譜關係 (Barthes, 1984／洪顯勝譯，1988，pp. 82-85)。這些系譜軸與毗鄰軸的分析都在探究符號系統的組合與建構，而非僅探尋符號意義的解析。

### 三、其他理論的詮釋分析

符號學方法經常引用人文、社會科學的相關理論，來進一步詮釋、解讀文本。誠如李幼蒸 (1998，頁212) 所言：「符號學應該關心社會人文科學的一切理論貢獻，並更切當地、更富創意地設法綜合這些理論成就。也就是說，符號學儘管以語義分析為中心卻應與社會人文科學的理論目標大幅重疊和統一。」因此符號學方法的運用經常不是單一方法論的操作，而是與其它方法、理論相互進行解析的工作。如廣告類文本普遍引用意識形態理論、性別理論、消費理論等對文化迷思進行批判的解讀。此外，亦有精神分析、馬克思主義、女性主義、後現代主義、後殖民論述等都是研究論文中常用的理論基礎。然而這些研究仍是聚焦在意義深究的討論中，對於符號學方法原初所欲分析的體系結構卻缺乏關注。

### 參、符號學方法的相關批評

針對符號學方法的批評經常環繞在研究者的身上，普遍認為符號學式的文本解讀需要分析者厚實的學術涵養，一個研究操作粗淺的分析者可能無法對於符號文化有深厚複雜的看見，也因此分析詮釋的可信度是令人質疑。同時研究者個人對文本的解讀分析，無法推論一個普遍概化的結論，也由於文本立意取樣的緣故，經常被質疑所選取的文本只



是推進、符合、驗證研究者主觀的推論（Leiss, Kline, & Jhally, 1986, p. 165）。這也是Rose（2001）在視覺研究方法的論著上所提出的疑問：「符號學執著於詳細解讀個別影像，讓人不禁質疑其分析的代表性及可否重複操作」。其研究的個案如何能代表一般性？選取個案的分析會不會成為推進研究者主觀的論點？研究者必須要意識到自身的詮釋活動，在解釋符號的同時，也「需要回過頭來審視自己創造意義的謀術」（Rose, 2001／王國強譯，2006，pp. 125-128）。因此，反身自省是符號學研究必須關注的議題，不論是研究者本身、研究對象、分析的符號系統，甚至是詮釋體系都應在研究進行中不斷進行反思。

此外，許多學者也提到了符號學의 文本分析鑽溺於符號意義的探究，而忽略了符號與社會文化關係的深度討論。李幼蒸（1998，頁210）即指出，符號文本和社會現實的關聯在研究中被忽略，研究者在文本世界中自得其樂。這種不適當性（inadequacy）是由於學術研究者被現存方法的既定組織原則所控制。如此，研究的過程僅是在套用固定的法則則作機械式的分析，研究者也只是在挖掘文本的意義而已。Rose（2001）也表示，符號學經常據守結構主義的傳統，而忽略了社會運作、制度、關係的生成，亦即符號學方法的考量可能影響研究者對文本的判讀，而忽略了生產文本的社會制度，同時也忽略了不同的閱聽眾、讀者或接收者對同一文本可能產生的不同反應（Rose, 2001／王國強譯，2006，pp. 127-128）。事實上，符號脫離不了與人的關係，個人就是使用符號的主體，同時符號的使用也必然是一種社會行為，與社會文化的關係緊密相扣。Saussure（1966）即提到：「要有語言，必須要說話的大眾……語言都不能離開社會事實而存在，因為它是一種符號現象。它的社會性質就是它內在的特性之一。」（de Saussure, 1966／高名凱譯，2003，p. 115）因此符號的分析如果僅鑽研在意義的探究上，就忽略了符號運作的社會事實。

劉慧雯（2002）也提到，許多符號學方法的研究都朝向一種純粹文本分析的討論，忽略了符號再現系統本身相關的歷史問題。研究者僅僅以一對一的對應方式來找出每一個符號的意涵，使得符號學方法的操作顯得封閉又簡化。符號學研究應指出社會歷史變遷在符號活動上的證據，針對符號的分析與討論，不能將它抽離在社會之外。她認為研究者不應只是探究符號意義的「對應」問題，而忽略了社會歷史演變所造成的「差異」問題，因此，提出了「語言系統中差異架構的修整」來檢視符號與歷史氛圍的關係。然而這樣的批評使我們必須重回Saussure的原初觀點，重新審視符號與歷史的關係。Saussure強調，他所研究的語言學

其「共時的」語言學比「歷時的」語言學更為重要，共時是現實性的符號系統分析，而歷時性則是言語活動演化的事實，兩者不能混為一談。因此在所謂探究社會歷史演變的符號差異時，必須思考是否已不同於Saussure所強調的共時性分析，而進入了符號歷時態的研究。有關共時與歷時的分析以下分段主題將有更詳細的討論。

事實上，劉慧雯（2002，頁211）也指出了，當前許多符號學方法的研究「錯將言語行動視作語言規則進行分析。這樣的分析將會完全忽略符號使用者的選擇活動對意義生產的決定力量。」這裡出現了二個議題，一則是錯將言語活動採用語言系統的結構法則進行分析；二則是符號文本的多義性問題。前者的問題在本文前言中亦有提及，綜觀近年來的研究論文，其研究的符號對象可以說多半是個別言語的活動，如果這些分析言語活動的研究不採符號結構系統的分析的話，就如同上述所言，應檢視符號在社會歷史中的演化狀態，則這樣的分析與Saussure結構主義符號學的概念已然不同，而是進入符號歷時態的討論。本文認為必須重申Saussure的論點，亦即共時結構分析與歷時演化分析必須要劃分清楚。第二個有關文本多義性的問題，劉慧雯（2002，頁210）則建議「符號學式的分析必須有閱聽人理解脈絡的進入，……目的在提醒符號學研究應該要關注的意義流動的問題」。確實，許多採用符號學方法的文本分析多鑽研在符號意義的不變性，也因此符號差異的問題普遍被忽略。有關意義流動的問題，以下進入Saussure的原典概念，返回符號可變性的思辯來討論。

## 肆、符號的可變性（mutability）思維

Saussure的結構語言學指出了社會成員在使用語言文字時不是自由的，而是強制的，是有系統、有規律可循的，不能隨意組合或運用的。比如文法的結構、用詞用語都有固定不變的法則與表意作用，亦即符號的不變性本身代表一種社會秩序的穩固性，旨在避開一切使它發生變化的可能性。但重要的是，符號的任意性卻也「使我們不能不承認語言（文字）的變化在理論上是可能的」（de Saussure, 1966, p. 73／高名凱譯，2003，p. 109）。事實上，符號通行於大眾之中，是一種集體社會的產物，社會成員時刻都在使用它們，如果要即刻改變符號或個人改變符號來達成溝通的目的是不容易的，如臺灣火星文網路次文化的產生，除了社會成員的集體惰性對新符號的創新會產生抗拒或不理解之外，意符與意指的連結基本上有其穩固的性質，不僅是因為集體共同使用，同

時更因為是處在時間的連續性之中，因著時間的累積而更加鞏固意符與意指任意連結的不變性。但意符與意指連結的任意性也潛藏著符號可變性的可能，意符與意指的連結既然是任意的，就具有隨意組織創新的可能。

有關符號的可變性，Saussure的論點是「時間」使得符號的使用保有連續性，符號正因為在時間性上是連續的，所以總是處在變化的狀態中，變化的原則是建立在連續原則的基礎上的。不管變化的因素是什麼，結果都會導致意符和意指關係的轉移。意符和意指關係有了轉移，符號和概念之間就出現了另一種新的對應。語言根本無力抵抗那些隨時促使意符和意指的關係發生轉移的因素，這就是符號任意性的後果之一（de Saussure, 1966, pp. 74-78／高名凱譯，2003，pp. 111-116）。換言之，從時間的觀點來看，時間既是意符與意指連結穩固的條件，同時亦可能是鬆脫其穩固性的因素之一。符號的任意性亦然，既是意符和意指之間一種強制的關係，亦帶來意符與意指關係流動的可能性。

符號系統可說是一種複雜的社會制度，一方面，處在使用它的集體大眾之中，同時又處在時間的連續之中，因著時空保有符號使用的持續性，使得符號具有其穩固性、同一性、強制性，因而難以改變；但另一方面，因著意符與意指連結的任意性，在理論上使得人們在符號材料和概念之間，有建立任何關係的自由，比如對新事物或新潮流創制新的語詞，常見於廣告文本中。因此符號就在不變性與可變性之中發展著，符號系統不但有穩固的連續性，但也在一切可能使它們的意符與意指之間關係鬆動的影響下變化著。這種發展是無可避免的，以語言的歷時態為例，我們從歷代的詩詞歌賦就可看見文字表意形式的演變，從古文、白話文運動，到當代使用的通用文體，確實可見語言文字的明顯轉移。換言之，符號在時間上的連續性與在時間上的變化是同時發展的，彼此相連共存的，也因此研究者在符號的分析上，不僅要探究意符與意指連結的深層文化意涵，同時也不可輕忽意符與意指之間關係微妙的變化，這些變化不僅是個別的，亦可能是社會的、文化的，如廣告創意的雙關語、同音異詞或流行用語等。

Barthes (1984) 在其**符號學要義**一書中，針對意符與意指的關係提出了幾項思考的嘗試：一是意指是落後於意符的，它僅僅可能通過意符而被加以研究；二為符號中具有一種存在於表述方面和內容方面之間的連結關係；三則是意符與意指之間具有一種不定的關係，僅僅在某些寄託的意義上，它們才是相一致的；最後，意符與意指的關係是在一種「等值」的形式中（Barthes用「≡」來表示意符等值於意指），而不是

在一種同一的形式關係中（意即「＝」等號）（Barthes, 1984／洪顯勝譯，1988，pp. 67-69）。換言之，意符與意指的關係是不定的，二者之間並不具有對等的關係，我們不能說意符等同於意指。符號只能是事物與概念的代表物或指涉代號，但不等同於事物與概念本身。

在意符與意指的二元關係中，Barthes強調了意符在關係中居於優勢的思考，它決定了事物與概念可理解的意義；再者，建立在表述與內容關係上的符號運作，如何表達牽涉到內容、形式的運作，這有如個人的言語活動，同樣的內容受到表述形式的影響。比如說、寫、影像即是各種不同的表述形式，不同的形式也將影響到毗鄰軸分析的元素；而用詞用語因人而異則影響符號內容的呈現，這些不同差異牽涉到系譜軸的分析。另外，意符與意指的關係必須連結在固定的意義上，否則二者的關係其實是可變動的，因為二者的關係並不對等，只是人賦予它們等值的關係。在不同的文脈中，意符亦有可能表示不同的意指，端賴與上下文的關係才能確定其意義。這些思考說明了意符與意指之間可能變動的關係，只要人們賦予意符新的意義，同時也獲得集體社會成員的認同與使用，則意符就鬆脫了原有固定連結的意指關係，而產製了新意義的連結。比如「八卦」一詞原與太極、乾坤之說有關，用於易經卜卦，然現今在通俗用語上卻與閒言閒語的概念連結。這些觀點說明了符號分析不一定要鎖住對應式的解讀，可以透過系譜軸相似或相異的分析來看意符與意指的隱喻變化，或者從毗鄰軸分析中來指出轉喻<sup>10</sup>的變化。

Saussure也強調，「語言中只有差異（differences）」，在意符與意指之間，語言不可能先於語言系統的觀念，也不先於聲音，語言是從語言體而來的概念差異和語音的差異（de Saussure, 1966, p. 120／高名凱譯，2003，p. 167）。可見對應意義的不變性固然重要，但意義的產生乃出於概念與符號的差異。Barthes（1970）不僅指出意符與意指關係的重新思考，更在S/Z中提出了差異性的閱讀策略，認為「差異」是閱讀過程中的一種生產，透過語言符號開放式的多重解讀，讀者可以形塑差異性的意義，也因此文本意義在差異間游走，而非在限定式的、唯一的意義侷限中（蔡秀枝，2003，頁37）。Barthes提出了可寫性文本（the writerly text）的重讀（re-reading）策略<sup>11</sup>，認為重讀可在文本的多變性和複數

10. 隱喻與轉喻為Jakobson發展出來的符號概念，認為系譜軸中可以從一個主題過渡到另一個主題，可稱為隱喻過程，而毗鄰軸上是通過相似關係或通過鄰接關係的概念，則稱為轉喻過程。參見Barthes（1988），符號學要義，洪顯勝譯，頁80-81；以及杜聲鋒（1988），拉康結構主義精神分析學，頁64-65。

性內增值意義，重新排整文本的內在順序，並放入「差異永不終止的系譜軸縱聚合中」，這是一種差異回返的閱讀（屠友祥譯，2004，頁8，頁22）。這說明了文本的多義性，也隱含著閱讀僅是選擇性的解讀。這些觀點帶給符號研究者在解讀策略中更多元的思維，提醒研究者在解讀文本的過程中，不應陷入單一意義的分析，也應避免採用對應式的意義思考。

## 伍、共時（synchronic）與歷時（diachronic）分析方法的檢討

Saussure將語言狀態的科學（或靜態語言學）稱為共時性分析，而演化階段的語言學分析稱作歷時性分析。Saussure以下圖標示出語言研究的形式（de Saussure, 1966, p. 98／高名凱譯，2003，p. 142）：

言語活動 (human speech)	語言 (language)	共時態 (synchrony)
	言語 (speaking)	歷時態 (diachrony)

一反當時盛行的語言歷史研究，Saussure強調語言系統的分析應該從「共時」的關係方面去加以考慮（高名凱譯，2003，頁127）。他指出，所謂的共時規律是一般性的，它憑藉集體習慣的約束而強加於個人，有關共時態的規律，就意謂著排列、規則性的原理。而歷時態卻必須有一種動力的因素，因而產生效果，造成演化的事實，歷時事件總有一種偶然的和特殊的性質（頁134）。亦即共時性的分析著重在同一個集體意識中，感知到同時存在並構成系統要素之間的共有邏輯關係。相反地，歷時性分析則研究各項不是同一集體意識所感到的相連續要素間的關係，這些要素一個代替一個，彼此間不構成系統（頁143）。簡言之，共時性的分析是符號狀態的分析，而歷時性的分析則是符號演化的分析。

然而，Saussure的結構語言學所強調的是共時性的分析，他認為共時性與歷時性二者「的重要性是不相等的。在這一點上，共時方面顯然

11. Barthes運用自創的暗碼與語段切割來重讀Balzac的小說*Sarrasine*，透過符號連結的相互指涉，來咀嚼出文本的差異性。見屠友祥譯（2004），*S/Z*，以及蔡秀枝（2003），「巴特S/Z中的轉向與閱讀策略」一文。



優於歷時方面，因為對說話的大眾來說，它是真正的、唯一的現實性」（高名凱譯，2003，頁130）。共時與歷時在方法與原則上是對立的，二者不可混為一談，共時是同時並存的事實，是規則系統的，而歷時則是語言的變化。裴文（2003，頁166）稱：共時是斷代研究，而歷時是歷代研究。對於Saussure而言，結構主義符號學的方法原則應落實在共時性的研究上，才能進入符號體系的分析中。Saussure（1966）即說：

系統永遠只是暫時的，會從一種狀態變為另一種狀態。誠然，價值還首先決定於不變的規則……語言也有這種一經承認就永遠存在的規則，那就是符號學的永恆原則。（高名凱譯，2003，頁128）

此處Saussure所言之不變的、永遠存在的規則即是符號系統的規則，也就是符號學研究的主要對象。系統雖然是暫時的，但符號學研究的永恆原則則是分析不變狀態下的系統規則，亦即共時態的研究。

有關如何準備符號學研究的素材議題上，Barthes（1984）在**符號學要義**一書中多次重申共時研究的重要，認為研究者要選擇研究的素材必須取決於所研究對象的「系統本質」，他提出兩項建議：第一、研究素材必須是足夠廣泛的，以便提出合理的推論；第二、這種素材必須儘可能是同質的，從內容上的同質性開始研究，再進行相同內容所構成的元素分析。Barthes在結論中強調，符號學研究必須：

及時地推動同質，在本質上，素材必須盡力排除歷時性的成份；它必須與一種系統、一種歷史的橫斷面相符合。……這種素材必須盡力保持接近共時性的趨勢。……符號學研究的基本目的（即最終被發現的東西）很明顯可能在於發現系統自身獨特的時間和形式的歷史。（洪顯勝譯，1988，頁120-121）

顯然，共時性分析在符號學研究上佔有重要的地位，是分析符號系統、結構、法則、規約的首要方法。事實上，在Saussure語言學的原典當中，系譜軸與毗鄰軸的操作是在共時性的分析下進行，是一種系統性的分析方法，與歷時態分析不同。

然Saussure以後，二〇年代的布拉格功能語言學派（Prague School）雖延續了Saussure語言理論的結構分析，更加確立共時性方法能獲得較多和較完整的研究，但卻重申了歷時性方法的合法性地位，「主張語言不論在共時或歷時的狀況均成一個系統，一個可以自我調節的系統」（齊隆壬，2003，頁5）。換言之，布拉格學派強調，不論在共時分析上或歷時分析上，都不能排除以「系統」為核心的研究方向。三〇年代哥本哈根學派（The Linguistic Circle of Copenhagen）的興起使得結構主義符號

學從語言中心的研究轉向文本的探究，因此影響當代符號學研究的思維與方向。「符號學研究方法的調轉，應合著結構主義語言學自身的發展與變化」。（齊隆壬，2003，頁8）。

經歷各學派的發展與影響，我們看見許多符號學方法書上，將共時與歷時的概念套用在系譜軸與毗鄰軸的結構分析中，這與Saussure起初的概念不同，但顯然受到布拉格學派影響，將歷時性考量放入研究分析中。比如Lacan在結構主義精神分析中將縮合、隱喻、替換、共時性的概念連結在一起，而移遷、換喻、組合、歷時性的概念也聯繫起來（杜聲鋒，1988，頁75），似乎將共時與歷時對等於縱聚合與橫組合。又如Hawkes（1977）提到符號學縱聚合與橫組合二個不同向度的軸線時，用圖解將縱軸向度標上選擇的、聯想的、共時性的、隱喻等詞，而橫軸向度則寫著組合的、句段的、歷時性的、轉喻等詞（陳永寬譯，1988，頁72），顯然將共時與歷時的分析放進系譜與毗鄰的分析操作中。又如Asa Berger（1982）在其媒介分析方法書上，也提到了共時與歷時的比較，同樣又見共時分析是直軸的分析，而歷時分析是橫軸的分析（黃新生譯，1992，頁22）。這樣的方法論述與Saussure的共時與歷時概念不同，Saussure是將直軸與橫軸的結構分析放在共時性分析中，亦即共時性方法中本身就必須涵蓋系譜軸與毗鄰軸的結構分析，對於Saussure而言歷時分析則是關於語音的變化、演化、類比、流俗詞源、粘合等的研究。而當今許多符號學方法書上將共時與歷時對比於直軸與橫軸（或系譜軸與毗鄰軸），這種方法概念上的差異，成為研究者在使用共時與歷時方法時必須重新省思的問題。

## 陸、返回符號體系的思考

在檢視共時性與歷時性分析的演變之後，研究者應該要返回符號系統的思考。Saussure（1966）曾提到，共時性分析要比研究歷時難得多，因為演化的事實比較具體，而符號狀態的構成因素與法則卻不易察覺（高名凱譯，2003，頁144）。Saussure被稱為結構主義語言學之父，乃在於他發展出符號狀態的系統分析，將語言狀態結構式的拆解，深掘語言體系的內部結構與法則。也因此針對體系的結構分析對符號學方法而言，顯然是本質上的研究目的。

Barthes（1983）在**流行體系**一書的前言中提到，此書正是一本有關方法的書，針對時裝雜誌所刊載的女性服裝進行書寫式的結構分析，其方法源自Saussure的符號學，研究對象則是雜誌中書寫服裝的修辭系統。

他提到，「為了建構一種結構，有效的做法就是把我們的研究局限於流行領域，即共時性。……流行的共時性是由服裝自我建構的」（敖軍譯，1998，頁21）。在這些共時結構的分析中，Barthes也註解，不排除對流行歷時性的一般思考（有關時裝的歷史與歷時放在原書後面的附錄中）。因此，在其方法操作的過程中，除意符、意指、系統的結構分析外，同時發展他的多層符號系統的意義分析（如四層意指系統的分析：真實服飾符碼、書寫服飾符碼、流行的含蓄意指、修辭系統），其意符與意指修辭關係的分析成為流行體系形構解析的重要操作，亦從分析中得見流行神話的建構。

Baudrillard (1968) 的物體系研究，將物體系分成功能性系統（物品系統化的客觀論述）、非功能性系統（物品系統化的主觀論述）、物品的內涵引申義（物品的意識形態意涵）、物品與消費社會的關係（意識形態體系）四個面向來討論。其研究的核心是物的結構語意系統的分析，研究過程中必須假設在物的結構語意系統中，有一個可與其分離的層次，而且此層次的結構嚴謹，如此才能進行結構分析。Baudrillard在研究中發現，在消費文化當中，物成了系統中的符號，這種身分的轉換，它變成了消費關係，成為一種「符號的系統化操控活動」。物的內涵引申義不斷被加重，並改變它技術面的結構，Baudrillard強調：物體系和語言系統不同，並不構成一個穩定的系統，而是處在演變的狀態。因此，物體系的描述一定要伴隨著體系實踐的意識形態批評（林志明譯，1997），才得見物體系中的論述結構與社會文化的關係。

電影符號學大師Metz在早期的論著中指出，「電影肯定不是一種語言系統，但它可被看作一種語言」（李幼蒸選編，1990，頁19）。他認為語言有特殊的語碼，但電影中卻無類似語碼的東西。雖然電影確實透過聲音、影像的基本元素編碼而成，並產生意義，進行意指的功能（signification）；但是電影製碼的過程不像語言系統一般受制於固定的法則。其後在1972年「論電影語言的概念」一篇講稿中，又比較了語言系統與電影的不同，Metz認為：電影與語言系統不同，不是一種雙邊交通的方法；不同於語言依賴任意性編碼原則，電影依賴於類比性編碼的原則；電影中的離散單元（discrete units）與語言系統中的離散單元極為不同（頁100-101）。在此Metz進入了電影語碼的討論，強調電影是一種複合的言語，其研究的目的就是「使隱藏在電影的天然性背後的編碼作用顯露出來」（頁101）。Metz提到，符號語言學的概念並不一定完全適用於電影現象全體，但符號語言學對於電影敘事性的研究確實是很有助益的（如意符和意指、外延和內涵、縱聚合與橫組合等等方法概念）。



一反他過去肯定的「電影不是一種語言系統」，Metz認為，儘管存在著各種困難，他仍舊「發現了電影語言系統（cinematographic language-system）這個概念的用途」（頁107）。換言之，Metz認為電影是一種特定的語言，它藉著影音的製碼說故事，這些影音連結而成的故事是可以結構性拆解的，因此Metz提醒研究者必須十分謹慎地將符號學概念應用於電影分析中。

從符號學重要的原典閱讀當中，可見符號學方法的運用，都不僅是鎖定在意義的對應上，更看重系統結構的運作關係，這也是傳播符號學研究較為缺乏的思維。事實上，我們在傳播符號學中經常看見的分析，都趨向於個案文本或某一類文本，有如個別言語活動的分析，誠然言語活動包括了語言系統和言語，但許多符號學研究的方向多指向意義的探索，而非語言系統的分析。由此，我們不得不審慎考慮，當研究者採用符號學方法時，運用體系的結構法則來分析言語活動是否有研究工具與操作的問題？所研究的文本是如何被製碼的？是否在一種特定的體系之中？或者非系統，但具有符號結構的形式？或者系統並不穩定，而是在演變的狀態中？研究者何以採用符號學方法來分析研究對象？其目的只是討論意義的生成？還是必須納入系統結構的討論？研究者應注意，符號學方法的分析不應忽略返回系統結構自身的討論，因為其研究的基本特質就是符號系統本身。

## 柒、結語

符號學方法運用在傳播研究上，經常用來解讀文本的文化意涵，其研究對象通常並非如Barthes所建議的有廣泛足夠的研究素材，而多是個案或是同一質性的某類文本（如某一類廣告、某一事件報導或某一類型電影等），這些研究對象有如某一類言語活動。固然言語活動包含語言與言語二部分，然Saussure結構語言學的研究強調其研究的對象乃是語言系統，而非言語行為。系統是一種社會制度，使用者必須受制於固定的法則；但是言語活動是多方面的、性質複雜的，牽涉到物理、生理和心理等領域，它不僅是個人的，同時也包含著社會關係（de Saussure, 1966 / 高名凱譯，2003, p. 30）。語言系統與言語活動是處在一種辯證的關係之中，它們有規律地相互依存、相互關係、相互制約（裴文，2003，頁156-157）。因此當研究者在進行符號學文本分析時，應注意到言語活動的複雜性，不僅是挖掘個別文本的意涵（個別性質），同時也要探討文本與社會文化的關係（社會性質），這使得我們必須小心回到Saussure

共時與歷時的概念。由於言語活動（各類文本）既是完成在一種系統結構中，又屬於個人與社會關係的產物，其分析顯然不僅是共時的系統分析，與社會文化的關係也要納入歷時的討論。符號系統的分析是一種同質結構法則的研究，而符號活動的分析則是更為繁複、多面向的研究。傳播符號學的研究對象以符號活動的分析居多，在操作符號學方法時需要非常謹慎小心，其方法運用的合理性需要更多的思考與討論。

傳播符號學研究經常將焦點放在符號意義的對應分析上，但意符與意指的連結既是不變的，也是可變的，研究者僅鎖定不變意義的分析，將會使得意義的討論趨於狹隘，應對符號的可變性意義有更多的關注，才能看見意義在社會文化中流動的差異變化。此外，共時性與歷時性分析的方法操作不可混淆，必須清楚明白Saussure在結構分析的觀點上乃出於共時的討論。雖然傳播符號學研究中多使用共時性的分析（系譜軸與毗鄰軸分析），但對符號體系卻似乎少有討論，將符號系統視為理所當然地合理化存在。然我們從原典閱讀中發現，符號學作為一種結構主義的方法論，在研究中不可避免地必須返回符號系統的討論，無論是不是構成一個特定系統，體系是否穩定，或所研究的文本是否受制於某一符號系統運作之中，或研究者自身是否也受制於某種詮釋的符號體系中。故此，符號系統反身性的討論有助於研究者在整體研究分析上，針對方法論建立理性（rationality）的思辯。

## 參考文獻

- 王念綺（2003）。另類醫療、醫療化與健康商品化現象：以芳香療法的新聞報導為例。未出版之碩士論文，國立政治大學新聞研究所，臺北市。
- 王家慶（1995）。從符號學詮釋批判臺灣的流行音樂文化。未出版之碩士論文，國立成功大學藝術研究所，臺南市。
- 王淑娟（1993）。解構電視廣告開喜茶系列廣告：符號學的分析途徑。未出版之碩士論文，銘傳管理學院大眾傳播研究所，臺北市。
- 吳家翔（1997）。解讀美體瘦身廣告的身體形塑意涵。未出版之碩士論文，世新大學傳播研究所，臺北市。
- 吳珮琪（2002）。解讀少女雜誌廣告中的美貌迷思。未出版之碩士論文，國立中山大學傳播管理研究所，高雄市。
- 李幼蒸選編（1990）。結構主義和符號學：電影文集。臺北市：久大桂冠。

- 李幼蒸（1998）。符號學和人文科學——關於符號學方法的認識論思考。《哲學雜誌》，23，208-222。
- 李欣榮（2006）。「紐約時報」與「人民日報」形塑臺灣之研究。未出版之碩士論文，中國文化大學新聞研究所，臺北市。
- 杜聲鋒（1988）。拉康結構主義精神分析學。臺北市：遠流。
- 林月芬（1993）。有線電視新聞台之選舉新聞分析——以臺中民主台及允中傳播公司為例。未出版之碩士論文，國立交通大學傳播科技研究所，新竹市。
- 林忠和（2005）。國軍募兵廣告意涵研究——平面廣告的符號分析與解讀。未出版之碩士論文，政治作戰學校新聞研究所，臺北市。
- 林信宏（2002）。運動廣告中的符號消費現象。未出版之碩士論文，南華大學傳播管理學研究所，嘉義縣。
- 林俊良（2001）。閱讀汽車廣告——廣告文本的性別與空間分析。未出版之碩士論文，國立臺灣大學建築與城鄉研究所，臺北市。
- 林政諒（1997）。廣告概念視覺化之研究——以分析臺灣礦泉水廣告影片之概念與意象為例。未出版之碩士論文，國立交通大學傳播研究所，新竹市。
- 林慧羚（2006）。電影呈現高跟鞋符號之研究——以「偷穿高跟鞋」為例。未出版之碩士論文，世新大學廣播電視電影學研究所，臺北市。
- 邱誌勇（1999）。消費藝術：電視廣告象徵符號的建構。未出版之碩士論文，輔仁大學大眾傳播學研究所，臺北縣。
- 柯永輝（1993）。解讀臺灣流行音樂中的女性意涵。未出版之碩士論文，國立政治大學新聞學系，臺北市。
- 洪盟凱（2001）。從史豔文到素還真：霹靂布袋戲之文化變貌。未出版之碩士論文，輔仁大學大眾傳播學研究所，臺北縣。
- 胡惠君（1997）。視覺符號認知研究——以美容塑身電視廣告為例。未出版之碩士論文，國立雲林科技大學視覺傳達設計學研究所，雲林縣。
- 唐維敏（1991）。電視廣告影像與意識型態的符號學分析——以司迪麥廣告為例。未出版之碩士論文，輔仁大學大眾傳播學研究所，臺北縣。
- 徐佳馨（2000）。漫步圖框世界：解讀日本漫畫的文化意涵。未出版之碩士論文，輔仁大學大眾傳播學研究所，臺北縣。
- 翁秀琴（1995）。以符號學理論分析汽車廣告。未出版之碩士論文，銘

- 傳管理學院大眾傳播研究所，臺北市。
- 翁宜寧（2000）。**奧運運動新聞文本分析：符號學觀點的研究**。未出版之碩士論文，國立體育學院體育研究所，桃園縣。
- 張淑寬（1995）。**從符號學觀點解釋洋酒電視廣告**。未出版之碩士論文，銘傳管理學院大眾傳播研究所，臺北市。
- 張斐茜（1994）。**以符號學來分析奇士勞斯基三色電影「藍色情挑」「白色情迷」「紅色情深」之女性意涵**。未出版之碩士論文，銘傳管理學院大眾傳播研究所，臺北市。
- 張毓吟（1994）。**圖像符號傳播的語文式思考：以符號學詮釋國劇臉譜為例**。未出版之碩士論文，國立交通大學傳播科技研究所，新竹市。
- 張瓊云（2000）。**電影音樂的符號性——以侯孝賢的電影為例**。未出版之碩士論文，東吳大學音樂研究所，臺北市。
- 梁惠明（1997）。**電視廣告——消費現實的影像夢境：以金飾、信用卡、汽車廣告為例**。未出版之碩士論文，輔仁大學大眾傳播學研究所，臺北縣。
- 陳明珠（2006）。符號的文化政治反思。在黃鈴媚、成露茜編，**傳播研究的傳承與創新**（頁159-175）。臺北市：世新大學。
- 陳奕宏（2003）。**臺灣報紙競選廣告政治符號分析：1989-2002**。未出版之碩士論文，中國文化大學新聞研究所，臺北市。
- 陳聖暉（1999）。**淡水有線電視購物頻道之塑身廣告文本公式研究**。未出版之碩士論文，輔仁大學大眾傳播學研究所，臺北縣。
- 曾維瑜（2000）。**閱讀日本偶像劇：「東京愛情故事」文本及「蕾娜塔報導」使用者**。未出版之碩士論文，世新大學傳播研究所，臺北市。
- 黃立翔（2003）。**電視競選廣告塑造政黨形象之研究——以2001年立法委員選舉國民黨廣告為例**。未出版之碩士論文，中國文化大學新聞研究所，臺北市。
- 楊淨嵐（2006）。**現金卡廣告——借錢迷思的塑造**。未出版之碩士論文，佛光人文社會學院傳播學研究所，宜蘭縣。
- 雷光夏（1993）。**從符號學觀點對電視節目聲音流程之初探**。未出版之碩士論文，國立交通大學傳播科技研究所，新竹市。
- 裴文（2003）。**索緒爾：本真狀態及其張力**。北京：商務印書館。
- 齊隆壬（1992）。**電影符號學**。臺北市：書林。
- 齊隆壬（2003）。**符號學方法論的整合與分析**。在世新大學共課委員會

- 主辦，人文社會科學後設理論及方法論的反思研討會，臺北市。
- 劉平君（1995）。解讀漫畫〈城市獵人〉中的女性意涵。未出版之碩士論文，國立政治大學新聞學系，臺北市。
- 劉慧雯（2002）。Saussure符號學理論在廣告研究中的應用：文本意義研究的更弦易幟。《新聞學研究》，70，197-227。
- 蔡秀枝（2003）。巴特 S/Z 中的轉向與閱讀策略。《中外文學》，31(9)，33-66。
- 賴怡茜（1994）。符號學的廣告運用方式研究：以中興百貨電視廣告分析為例。未出版之碩士論文，銘傳管理學院大眾傳播研究所，臺北市。
- 蘇玲霞（1989）。從記號學的觀點分析和解釋洋煙廣告的內容。未出版之碩士論文，文化大學新聞研究所，臺北市。
- 蘇振昇（1998）。臺灣流行音樂中的愛情價值觀：1989-1998。未出版之碩士論文，國立中山大學傳播管理研究所，高雄市。
- 蘇偉華（2000）。酒類廣告迷思與理解之研究——以成年學生為例。未出版之碩士論文，淡江大學大眾傳播學研究所碩士論文，臺北縣。
- 顧玉珍（1991）。解讀廣告中的女性意涵。未出版之碩士論文，政治大學新聞研究所，臺北市。
- Barthes, R. (1988)。符號學要義 (*Elements of semiology*) (洪顯勝譯)。臺北市：南方。(原作1984年出版)
- Barthes, R. (1997)。神話學 (*Mythologies*) (許薔薔、許綺玲譯)。臺北市：桂冠。(原作1957年出版)
- Barthes, R. (1998)。流行體系(一)：符號學與服飾符碼 (*Systeme de la mode*) (敖軍譯)。臺北市：桂冠。(原作1983年出版)
- Barthes, R. (2004)。S/Z (屠友祥譯)。臺北市：桂冠。(原作1970年出版)
- Baudrillard, J. (1997)。物體系 (*Le systeme des objects*) (林志明譯)。臺北市：時報。(原作1968年出版)
- Berger, A. A. (1992)。媒介分析方法 (*Media analysis techniques*) (黃新生譯)。臺北市：遠流。(原作1982年出版)
- De Saussure, F. (2003)。普通語言學教程 (*Cours de linguistique generale*) (高名凱譯)。北京：商務印書館。(原作1949年出版)
- Fiske, J. (2003)。傳播符號學理論 (*Introduction to communication studies*) (張錦華等譯)。臺北市：遠流。(原作1990年出版)

- Hawkes, T. (1988) 。*結構主義與符號學 (Structuralism and semiotics)* (陳永寬譯) 。臺北市：南方。(原作1977年出版)
- Rose, G. (2006) 。*視覺研究導論 (Visual methodologies: An introduction to the interpretation of visual materials)* (王國強譯) 。臺北市：群學。(原作2001年出版)
- Berger, A. A. (1982). *Media analysis techniques*. London: Sage.
- Barthes, R. (1974). *S/Z* (R. Miller, trans.). New York: Hill and Wang. (Original work published 1970).
- De Saussure, F. (1966). *Course in general linguistics* (W. Baskin, trans.). New York: McGraw-Hill Book. (Original work published 1949).
- Fiske, J. (1990). *Introduction to communication studies* (2nd ed.). London: Routledge.
- Leiss, W., Kline, S., & Jhally, S. (1986). *Social communication in advertising: Persons, products and images of well-being*. New York: Methuen.
- Noth, W. (1990). *Handbook of semiotics*.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 Rose, G. (2001). *Visual methodologies: An introduction to the interpretation of visual materials*. London, Thousand Oaks and New Delhi: Sage.